

西滢文录

陈西滢 著

陈子善 范玉吉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滢文录

陈西滢 著

陈子善 范玉吉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滢文录/陈西滢著;陈子善,范玉吉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75-0

I. 西… II. ①陈… ②陈… ③范…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808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辑 杨 力 王丽君

美 术 编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对 刘 璵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 数 20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0.60 元

本书说明

陈西滢的名字,凡是读过鲁迅著作,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以往人们只注意二十年代鲁迅与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却忽略了陈西滢本世纪上半叶在文化批评、文艺评论和文学翻译众多方面的成就,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出身于思想开明的书香世家。1912年赴英留学,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曾得到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指导,1922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但他志在文学,尤钟情于英国文学,回国后于1923年出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教授,并常在《晨报副刊》、《太平洋》等刊发表作品,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坛上崭露头角。

1924年12月,陈西滢与王世杰、周鲠生、陶孟和等人合作创办“公共论坛”——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为拓展当时的批评空间而努力。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又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1927年春,陈西滢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合,同年底以北大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访问日本。1929年秋起执掌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长达十年之久。他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造就不少研究人才,还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撰写中外文学评论,翻译出版了《少年哥德之创造》、《父与

子》、《梅立克小说集》等外国文学名著。

抗战爆发后，陈西滢先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3年赴伦敦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为促进英国各界人士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认识颇多贡献。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从此定居伦敦，1970年3月29日病逝。

陈西滢生前出版的著作只有《西滢闲话》(1928年6月新月书店初版)一种，此书虽多次重印，六十年代在台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大陆又曾重版，可以代表陈西滢的文化观和文学批评观，但他还有大量文化和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创作散见于二、三十年代各大报刊，毕竟不利于全面深入的研究陈西滢其人其文。陈西滢逝世后，台北萌芽出版社于1970年6月出版了《西滢后话》一书，这是陈西滢佚文的首次结集，可惜入选文章中六篇是翻译，杂文、评论和小说只有九篇，即《菊子》、《闲话》二篇(《官僚》和《物质文明的上海》)、《日本闲话》三篇(《汤屋》、《警治》和《普选》)、《武器与武士》、《整理国故与“打鬼”》和《野玫瑰》，后八篇于1992年12月作为“附编”编入海天出版社初版的《西滢闲话》，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1996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陈西滢、凌叔华合著的《双佳楼梦影》，编入《菊子》、《听琴》、《曼殊斐儿》、《我们也可以试试吗？》等四篇集外佚文和陈西滢女儿陈小滢整理的日记片断《拜访福斯特》。这样，读者此前所见到的陈西滢佚文总共仅十二篇而已。

这部《西滢文录》收入陈西滢集外佚文四十二题四十九篇(上述十二篇已包括在内)，分别刊载于《晨报副刊》、《太平洋》、《小说月报》、《新月》、《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武汉日报》等刊，是迄今为止陈西滢佚文最为齐全的搜集整理。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文化批评，涉及中日文化的诸多领域；第二辑文学评论，有书评，随感和论文；第三辑系为自己的翻译和他人的著作所作序跋；第四辑是小说、散文，《成功》堪与朱自清名篇《背影》媲美，最后一篇则是陈

西滢晚年关于“新月社”的重要回忆。

梁实秋称誉《西滢闲话》“见解纯正，文字优美”，“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这批佚文。陈西滢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比较、鉴别、选择，固不乏精到之见，同时也显示了文化认同的焦虑，特别是他注重理性、崇尚自由并力图规范批评秩序的文化心态在这批佚文中也有清楚的体现。对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兴趣的读者自可细细品评，从中领悟对重估现代文学和文化具有启示的“新气味，新刺戟”（钱穆语）。

限于体例，陈西滢的政治和军事评论不收入本书；陈西滢三十年代中期还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发表《作家杂话》数篇，也因限于条件而暂付阙如，留待今后增补。

陈子善

1998年8月15日于酷暑中的上海

【目录】

本书说明

- 整理国故与“打鬼” / 1
- 物质文明的上海 / 8
- 官僚 / 11
- 做学问的工具 / 14
- 从寒假说到三学期制 / 19
- 张冠李戴的画像 / 22
- 日本闲话 / 25
- 普选 / 25
- 汤屋 / 31
- 警治 / 34
- 西京通信 / 37
- 谷崎润一郎氏 / 37
- 几种并不科学的统计 / 41
- 杂志和圆本 / 45
- 我们也可以试试吗? / 52

二

论翻译 / 56

曼殊斐儿 / 66

易卜生的戏剧艺术 / 80

《危险之年龄》/ 91

译本的比较 / 96

显尼志劳的剧本 / 110

《涡堤孩》/ 130

看新剧与学时髦 / 136

悬亲会式之演剧 / 146

哈蒲曼的《织工们》/ 146

莎士比的《仇里西撒》/ 153

莎士比亚(?)名剧《汉孟雷特》/ 154

新剧与观班 / 157

武器与武士 / 161

《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基础》/ 166

“公共汽车本子”/ 171

《写戏方法》/ 176

西方人之东方小说 / 179

新剧本选 / 187

添在孙译《安特利亚·代尔·沙多》后面

的蛇足 / 191

《明天》解说的商榷 / 196

《野玫瑰》/ 204

《春雷》/ 207

三

《少年哥德之创造》译者序 / 214

《父与子》译者的话 / 216

《梅立克小说集》译者序 / 219

《太阳与月亮》译后附言 / 221

《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译后附言 / 224

《贴身女仆》译后附言 / 227

《花之寺》编者小言 / 228

《灯光》序 / 229

四

菊子 / 231

成功 / 235

听琴 / 246

过年 / 251

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 255

关于“新月社” / 261

——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

整理国故与“打鬼”

浩徐先生：

今天看见一〇六期的《现代》，读了你的“主客”，忍不住要写几句话寄给你批评。

你说整理国故的一种恶影响是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此话却不尽然。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这是大家应该原谅的。

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因为前一种原因）有时是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的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极赏识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弟兄，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

第三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他们本没有什么自觉的主张，又没有文学的感觉，随笔乱写，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吴老先生作幌子。这种懒鬼，本来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去，由他们去自生自灭吧。

这三种来源都和“整理国故”无关。你看是吗？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灌注在修词造句上，方才可以做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例如做“述学”的文字，如章实斋年谱之类）便成了“非驴非马”

的文章了。

大概我们这一辈“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的儿女的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的；国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人的缺点了。

但是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第二，在现时的作品里，应该拣选那些用气力做的文章做样子，不可挑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

其次，你说国故整理的运动总算有功劳，因为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去寻求新知识与新道德。你这个结论，我也不敢承认。

国故整理的事业还在刚开始的时候，决不能说已到了“最后一刀”。我们这时候说东方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文明”，这种断语未必能服人之心。六十岁上下的老少年如吴稚晖、高梦旦也许能赞成我的话。但是一般黑头老辈如曾慕韩康洪章等诸位先生一定不肯表同意。

那“最后一刀”究竟还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等他们用点真工夫，充分采用科学方法，把那几千年的烂帐算清楚了，报告出来，叫人们知道儒是什么，墨是什么，道家与道教是什么，释迦达摩又是什么，理学是什么，骈文律诗是什么，那时候才是“最后一刀”收效的日子。

近来想想，还得双管齐下。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

宗杲和尚说的好：“我这里无法与人，只是据款结案。恰如将个琉璃瓶子来，护惜如什么，我一见便为你打破。你又得得摩尼珠来；我又夺了。见你恁地来时，我又和你两手截了。所以临济和尚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你且道，既称善知识，为什么却要杀人？你且看他是什么道理？”

浩徐先生，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什么他到了巴黎不去参观柏斯德研究所，却在那敦煌烂纸堆里混了十六天的工夫？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

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

你说，“我们早知道在那方面做工夫是弄不出好结果来的。那是你这聪明人的一时懵懂。”这里面有绝好的结果。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学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腐臭，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西澂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澂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书里曾说，依胡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也不过如此而已。（原文记不起了，大意如此。）老实说来，这正是我的大成绩。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

禅宗的大师说：“某甲只将花插在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把戏千万般，说破了“也不过如此”。（下略）

适之。十六、二、七。

适之先生要我看完这信，转交给浩徐。这时浩徐不在北京，好在适之先生本预备发表，所以就在这里发表了。

适之先生说我批评他的作品，单取他的文存，不取他的哲学史，因此断定我“究竟是一个文人”。这话也许有部分的理由，因为正如适之先生所说：“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可是我并不是单把文章好坏做我去取的标准。文存里大部分是提倡革命，扫除旧思想，建设新文学的文字，在那里适之先生引我们上了一条新路。可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当儿，胡先生忽然立停了脚，回过头去编他的“哲学史”了。固然不错，他做的还是破坏的功夫，“捉妖”“打鬼”的事业，只是他丢开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加重要的工作。没有走过的新路是不容易走的。前面得有披荆斩棘的先锋，熟识途的引导者。适之先生的地位应当在那里。可是他杀回头去了，所以虽然还有些人在新路上往前觅道，大部分的人只得立住了脚，不知道怎样好。更不幸的，一般近视眼的先生，不知道胡先生是回去扫除邪孽，清算烂帐的，只道胡先生都回去了，他们更不可不回去了。于是一个个都钻到烂纸堆里去，“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弄得乌烟瘴气，迷濛大地。吴稚晖先生说：“胡先生的大纲，只有一部分浇块垒的话头，虽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险，容易发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胡先生所发生的一点革命效果，不够他们消灭。”他的话真是说的入骨三分。所以对吴老先生的又一句话，线装书给胡先生看，他“是热烈赞同的”，我实在热烈的不赞同。我以为别人可以“整理国故”，适之先生却不应当“整理国故”。这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老实说，我对于“整理国故”这个勾当，压根儿就不赞成。本来，一个人喜欢研究国故，犹之另一个人喜欢研究化学，第三人喜欢研究昆虫，他有绝对的自由，用不着我们来赞成或反对。可是研究化学的人，在试验室静悄悄的做他的试验。研究昆虫

的人，不声不响的在田野中搜集他的标本，只有研究国故的人整日价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吵得我们这种无辜的人不能安居乐业，叫人不得不干涉。国故学者总以为研究国故是“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自己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任公先生更进一步，说无论什么人没有读他开的书单，就“不能算中国的学人”；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浩徐先生说：“国故整理运动倒也不是完全无益”，因为“国故整理家对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使以后的青年们能够毫无牵挂地一心一意地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我们不能不说他实在看错了。那“最后一刀”的结论，适之先生已经不敢承认了，虽然他说“究竟还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可是，我们试问，除了适之先生自己和顾颉刚、唐肇黄、钱玄同等三四位先生外，哪一个国故学者在“磨刀霍霍”呢？唉，哪一个不是在进汤灌药，割肉补疮呢！哪一个不是在垃圾桶里掏宝，灰土堆中搜珍奇呢！青年们本来大都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整理国故”既然这样时髦，也难怪他们随声附和了。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整理国故”的时候。一座旧房子里的破烂家具，无论你怎样的清查，怎样的整理，怎样的搬动，怎样的烧劈老朽，怎样的重新估定价值，怎样的报告一个“不过如此”，弄来弄去，左不过还是那些破旧东西。而且“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外国人登广告的目的，就利用人们对于常常耳闻目睹的东西认为自然良好的心理。所以一个人整天钻在烂纸堆里，他也许就慢慢的觉得那也不是什么索然无味的事，甚而至于觉得都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了。所以我们目前的急需，是要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电灯、自来水，造新的厨房，辟新的毛厕，添种种新的家具。新的有用的来了，旧的无用的

自然而然的先被挤到一边去，再被挤到冷房子里去，末了换给打估的人了。所以只有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然后才能“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最后的一刀。要是倒因为果的做起来，那一刀是万杀不进去的。这时候我们大伙儿一心一意的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还嫌“力薄能疏，深惧陨越”，哪里再有闲功夫去算什么旧帐？

还有一层，我觉得现在的国故学者十九还不配去整理国故。他们大家打的旗帜是运用“科学方法”。可是什么是科学方法，离开了科学本身，那所说的“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他又怎样的能用科学方法呢？而且，用“科学方法”做工具，去整理国故，与用“外国文知识”做工具，去翻译西方的各种学识一样的可笑，一样的荒唐。一般人都以为一个人认识了几个洋字，就可以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洛依特的心理学、拜伦的诗、法郎士的小说，而且有人就这样做。不知道一个人学了几年物理，还不一定懂得相对论，一个人没有细心研究过心理，断不能懂佛洛依特的学说，一个人没有注意过英法两国的人情风俗，思想潮流，也不能完全了解拜伦的诗、法郎士的小说。研究国故不也是这样的吗？什么是国故？是不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成绩都包括在里面？适之先生似乎是这样想，因为他说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工作是不是一个仅仅能读几本线装书的人，挟了“科学方法”所能够胜任的？还是要让经济学者去治经济史，政治学者去治政治史，宗教学者去治宗教史，文艺批评者去治文学史艺术史呢？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要这些人都去研究经济、政治、宗教、文艺等种种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艺术；我们要他们介绍种种欧美各国已经研究了许多，已经有心得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艺术给我们，没有时候去弄“国故”那玩意儿。再过几十年，他们也许有这样的余力

了,这样的闲暇了。那么到那时再说“整理国故”不好吗?

(原载 1927 年 3 月 26 日《现代评论》第 5 卷第 119 期)

物质文明的上海

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同时又有人说，上海没有文化。我们看来，上海的确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而且确有它特殊的文化。人生最大的需要是衣食住行。这第四项，据说在最新的学说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不看见胡适之先生游历了欧美回国，第一次公开的发表他的感想，就大鼓吹汽车文明吗！上海的汽车比较目下的纽约，固然望尘莫及，可是比较大战前的伦敦巴黎，恐怕也不会相形见绌到哪里去。而且听说上海的洋车虽然没有消灭，它的数量，也只不过比汽车多一倍，那么完全淘汰也该不是很长久的事。并且汽车之外，上海交通的方法多的是：电车、公共汽车，和五六年前我们在欧洲还没有看见过的无轨电车，像蛛网似的联络着，像流星似的飞闪着。那么，胡先生所希望的汽车文明虽然还没有实现，可是在行的一字上，上海的文化是很可以自豪的了。

我们再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的附近去走一回，就可以看见无数的宽敞的花园，精致的别墅，住在里面的舒服，我们相信一定远胜于北京的清故宫和古代的什么阿房宫、金谷园。就是经过上海暂住的旅客，也一定会觉得大华、华安的饮食起居比哪一个大会馆的旅馆都比得上吧。再走到南京路，极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一连就有三个，其余的中国的，外洋的种种色色的衣食杂用的商铺，五光十色，叫人眼睛都看得晕花。此外有的是戏园、电戏、咖啡馆、跳舞场，公娼、私娼、赌场、烟窟，以及种种说不出，想不到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样，娱乐的场所。我们还